



茅盾
巴金
丁玲
曹禺
谢冰心
艾青
李季
周立波
孙犁
梁斌

成功之路

北京出版社

1206.7/25

成功之路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0349



北京出版社

830349

成功之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61,000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9,000

书号：10071·346 定价：0.69元

目 录

文学巨匠

——记茅盾..... DC71.495 李 岛 (1)

雪下的火山

——记巴金..... 陈丹晨 (41)

在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

——记丁玲..... 王淑秧 张 炯 (65)

阅尽风霜君更健

——记曹禺..... 黄维钩 陈骏涛 (109)

她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

——记谢冰心..... 郑荣来 (132)

他依然年轻

——记艾青..... 谢 冕 (153)

泥土和石油的歌者

——记李季..... 雷 达 (177)

根深·叶茂·花繁·果硕

——记周立波……………雷声宏（205）

扶犁人

——记孙犁……………盛 英 李克明（232）

辟席敢闻文字狱，著书非为稻粱谋

——记梁斌……………蒋守谦（252）

文学巨匠

——记茅盾

李岫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这个古老的市镇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镇中有个寺，相传是梁昭明太子偶居读书的地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延博的故居。镇上约有五六万人口，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混杂的埠头，联接着四通八达的水道，小石桥下泊着“赤膊船”，河岸上成片的桑园，以及蚕忙前夜的“香市”，构成了这个江南城镇独特的镇容。镇的周围是沉着的、执拗的、步履缓慢的乡村。作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已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末期了。他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思想属于“维新派”，很喜爱自然科学，曾自习学到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是一位名医的独生女，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茅盾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父亲三十多岁便去世了，故前曾嘱咐雁冰与弟弟泽民都要学工程才好，但他们兄弟两人都没有遵照父亲的遗嘱立身。

当他在嘉兴二中上学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嘉兴二中校址正在铁路线上，离上海不过三小时路程。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播开来。雁冰和同学们常到车站去从旅客手中买上海出版的报纸，并且割去了辫子。但是，革命过去了，革命后的社会还是老样子，代之而来的是学校当局的专制。为了报复新舍监的专横跋扈，雁冰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舍监，并在红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从此他被嘉兴中学开除，不得不转入安定中学。当回首这段往事时，茅盾说：“我的中学生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

中学毕业后，茅盾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茅盾明确而坚实地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战场。

年轻的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和翻译家

五四时期的茅盾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译介者。

一九一六年，茅盾刚二十岁，在一个表叔的推荐下，跨进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深厚的古文及外文根底，使人们大为惊异，当得知茅盾从

中学到大学期间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时，一个叫孙毓修的不禁问道：“你不过二十岁，哪有时间看这些书？”甚至推测他定是名门望族子弟。他撰稿、翻译、编纂《中国寓言初编》、校印《四部丛刊》……在编译所的九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校对、编辑人员而成为年轻的文艺革新家、翻译家。

在编译所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茅盾就在这一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外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茅盾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中去，也是在这种思潮指引下进行翻译工作的。“五四”以前，他已发表了很多译作，如《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履人传》、《缝工传》、与弟弟沈泽民合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理工学生在校记》等等。“五四”以后，为了介绍外国的新学说、新思想，茅盾对俄国文学和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投以极大的注意力，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而且是用白话文翻译的，有契珂夫的《在家里》、《卖诽谤者》、《万卡》，高尔基的《情人》，莫泊桑的《一段弦线》，梅德林克的《丁泰琪之死》，尼采的《新偶像》、《市场之蝇》等。他编选的外国文学集子《桃园》、《雪人》等被人们公认为当时最好的选本。此外还写了不少介绍俄国文学、苏联文学及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是试图探讨文学对社会思潮究竟能起什么影响，是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拿来主义”的一种尝试。他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反对旧道

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一种武器。他是那样细致入微地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中发现灵魂的砂砾里有真金，发现传统思想与制度的背面有光明，他充满对弱小民族及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同情，他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推崇，对被损害民族要求正义要求人道的呼声、对于那种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对被奴役和戕害的灵魂的热爱，对苏联文学的赞扬，都浸透着茅盾青年时期的爱与憎，体现他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与美学理想，为他后来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奠定了基础。

仅仅把茅盾看作一个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是不公平的。他开始文学活动的同时，就以社会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思想革命的战场，而且是我党初创期的党员之一。

大约是一九二〇年春天，陈独秀在上海接见了沈雁冰等人，和他们共商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的大计。早在《新青年》初创时，沈雁冰就经常阅读，很受鼓舞。他说过，“我在那时看到这些书籍刊物，感到刺激力很强，以前人好象全在黑暗当中，到那时才突然打开窗户。”沪编《新青年》第一期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同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茅盾是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茅盾经常去渔阳里二号过组织生活，讨论发展组织、工人运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次开支部会，都要深夜才回到家，母亲总是在给他等门。从这以后，母亲也逐渐明白，雁冰已经是共

产党员了。

一九二一年冬天，陈独秀居住的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查抄，陈独秀夫妇均被捕。从此，《新青年》被迫暂时停刊，支部生活的地点不得不改动。虽然风波过后，陈独秀很快获释，但他的寓所已不宜作党中央办公地点。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他当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支部会议也每每在雁冰家里进行。凡地方给中央的信件一律寄到商务交沈雁冰收，内封写“钟英”（中央的谐音）二字，由雁冰汇总交给中央。

茅盾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员，工作一忙，写稿和外出约稿的时间就少了。正在这时，郑振铎从交通部铁路管理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西站当练习生。不久，他当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和铁路分了手，和文学结了缘。之后，雁冰又介绍他进入商务编译所。郑振铎到编译所工作后，大大减轻了沈雁冰在编辑事务上的负担，他们共同创办《文学旬刊》，附在《时事新报》上。

沈雁冰与郑振铎的友情和新文学史上的两件大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小说月报》的革新。

一九二〇年十月，被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的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

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文学应当担负“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都显露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明显倾向，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艺术”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用自己笔下的文学形象对人生进行着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文学研究会从成立到大革命后解散，坚持了十年的战斗，成为党领导文学革命、推动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

《小说月报》，这个创刊在宣统年间的刊物，对人生抱着游戏和冷嘲的态度，是一种买办意识与封建思想的混血儿，十余年来，逐渐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堡垒。这时，在文学研究会会员们的支持下，《小说月报》全部革新了。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的，有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

《小说月报》从一九二一年一月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这个顽固派的堡垒被打开缺口是很不容易的，打开缺口的人，正是茅盾。茅盾曾风趣地说：“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

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鸳鸯蝴蝶派失去了阵地，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则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就有读者说：“《小说月报》如黑暗中一颗明星，引文学者到文学应走的路。”从此，我国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文学、宣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抨击旧道德、旧文学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后郑振铎、叶绍钧接办，一直保持着《小说月报》革新后的优良传统，而且发表了许多后来成为大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如丁玲的《梦珂》、巴金的《灭亡》，茅盾自己的《蚀》三部曲，以后也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总之，它的革新给寂寞单调的创作界带来了蓬勃滋生的时代。从历史上看，新文学史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不仅作家寥寥，期刊也很少，作品没有发表的阵地。后五年则不同了，文学团体和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到处有新文学活动的踪迹和声息。茅盾曾把这比成尼罗河的大泛滥，大群年轻有为的作家从那狂猛的文学活动的洪水中练得一身好本领，使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这其中，《小说月报》起了打头阵的作用。茅盾以攻关的勇气和毅力，改革了《小说月报》，又以园丁的辛勤，精心培育着这朵新文学运动的鲜花，使之蔚蕤茂盛，不见凋败。

《小说月报》的革新激怒了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们。他们不仅失去了地盘，而且遭到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员们的批判。沈雁冰说，“文学的最大功用，在充实人生的空泛，而名士派的文学作品，叫人看了只觉得人生是

空虚的。文学的效用既失，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用处！还成什么文学！”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名士派游戏文学退居到自己出版的无聊刊物《礼拜六》、《游戏世界》上，一方面用黑幕、娼门、武侠、神怪、宫闱等小说维持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方面对《小说月报》及其主编沈雁冰大施攻击，一骂骂了一年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沈雁冰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义正辞严地驳斥并回答了鸳鸯蝴蝶派先生们的攻击，这篇文章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响应。正因为如此，鸳鸯蝴蝶派文人反而恨之更甚，竟至后来引起他们对商务当局的诉讼案，要控告《小说月报》破坏了他们的名誉，提出要《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写文章公开表示道歉。沈雁冰不仅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而且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登在《新青年》和京沪四大报的副刊上，以唤起全国舆论。这一来，鸳鸯蝴蝶派只好偃旗息鼓了。

在鸳鸯蝴蝶派一蹶不振之后，第二个大胜仗是对宣扬复古倒退的学衡派的论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买办文人退出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后，和封建复古势力互相勾结，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向新文化运动发起猖狂进攻。学衡派一出现，鲁迅写了《估学衡》，入木三分地揭露他们“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文学研究会的人积极参加这一论战，沈雁冰先后写过七八篇文章，揭露学衡派对西洋文化的无知和妄说。沈泽民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也写过反击学衡派的文章。在文化新军的反击下，不久学衡派就土崩瓦解彻底垮台了。

一九二三年，茅盾辞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在我们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义务教授“小说研究”。当时，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是二十四岁的瞿秋白同志。一九二四年，茅盾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会议常在他家中举行，秋白同志代表党中央常来出席，两人不仅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还经常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茅盾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历史终于把他造就成一个文学上的巨人。

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大浪淘沙。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分化，有的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有的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操守，与时代俱进，茅盾正是这支队伍中极坚实的一个。

茅盾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自己曾说：从《蚀》以后，“我走上了职业的写作者这条路了。”他经历了从“五卅”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

一九二四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同志在上

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一九二五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斗争胜利后，他离开商务，专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元旦，茅盾搭上开往广州的醒狮号轮船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操在我们党手中，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编辑部除一人外，全部是共产党员，所以报纸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这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说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那个时代是充满矛盾斗争的时代，参加革命斗争的许多小资产阶级

青年，在现实的变幻里，也充满矛盾和苦闷。茅盾说，“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漩涡——一大矛盾”，“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漩涡、一大矛盾”，矛盾促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也促使他拿起笔反映这样一个大革命时代的现实，反映这个时代许多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精神面貌，反映他们理想的幻灭、动摇、追求的矛盾心理。当《小说月报》要发表《蚀》时，他便信手写上笔名“矛盾”二字。他说，“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好象是随手拈来，然而也不尽然。‘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的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蚀》发表时，名字却变成“茅盾”了。这是因为《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先生“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假名，怕引起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代我在‘矛’字上加上草头，成为‘茅’字，百家姓中大概有此一姓，可以蒙混过去。”从此，茅盾这个名字，就成为中国和外国读者都熟悉的大作家的名字了。

茅盾是一位富有时代性的作家。他很早就认识到“社会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这个道理。这是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要求。他深信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

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之后才来做小说。而他既爱左拉，也爱托尔斯泰。他的文学主张显然受过左拉的自然主义的影响，可是到他自己开始写小说时，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的确如此，从写《蚀》起，他并不是依照自然主义去创作，而是经验了人生之后的人生的写照。

一九二七年夏天，茅盾在牯岭养病。严重的失眠症折磨着他，他总是睁着眼度过每一个短促的夏夜，静听牯岭的山风摇曳着窗户；白天译点小说，或和来这里探访名山的新旧相识聊聊天，其中有一位“多愁多病”的云小姐，自称已是肺病第二期，病是有的，然而那种时而消极、时而兴奋、时而幻灭、时而动摇的病态心理也是有的，她说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就象中古的罗曼斯，本身就可以写一部小说。茅盾对此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那时就产生要做一篇小说的想法。

秋天回到上海，妻子病了，茅盾陪伴着妻子，在病榻旁一张小桌上写下《幻灭》的前半部。待妻的病好，便独自关在三层楼上写完了《动摇》和《追求》，这就是《蚀》的三个连续性的中篇。这三篇小说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作品中写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女性，她们身上既有那位云小姐的影子，但又不是云小姐。比如《幻灭》中的静，她对革命先是追求而后幻灭的过程，概括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渴望革命，然而找不到方向，迷惘、彷徨，最后也